

A portrait of Zhang Zhi, a man with a shaved head,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colored wall with faint, handwritten-style Chinese text. Overlai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ortrait is the large, bold, red text "张执一" (Zhang Zhiyi). To the right of this text is a vertical column of red text: "热血" (Hot Blood), "不渝" (Unwavering), and "执一" (Zhiyi).



张执

執一不渝 热血洗苍穹

本书编辑组编

文集上

華文出版社

華
文
出
版

上

把抗日、民主、反内战的旗帜高高
举起：一二九，西安事变
救国会、提分救亡运动

執一不渝 熱血洗蒼穹

張執一文集

上 卷

本書編輯組 編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执一文集 / 本书编辑组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6.5

(统一战线人物传记)

ISBN 7-5075-1917-1/D

I. 张… II. 张… III. ①张执一-文集 ②统一
战线-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76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40.25 印张 1013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59 元



张执一同志(1911.5.5—1983.5.11)

序

刘延东

张执一同志文集《执一不渝，热血洗苍穹》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张执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积极投身党的事业。华北事变后，曾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豫鄂边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积极做好新四军和抗日友军的统战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等地，参与领导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宣传和组织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又作军运工作和文化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他曾四次到台湾，宣传党的民主和平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全国解放以后，他由中南局调任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张执一同志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他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执一同志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他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执一不渝，奋斗终身。他刚直不阿，襟怀坦白，积极进取，认真负责，关心爱护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他的朋友面很广，包括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工商界、各民主党派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台湾同胞各个方面。他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对他们关心帮助，肝胆相照。赵朴初同志曾在挽诗中评价张执一，“铁肩担道义，赤胆当荆棘”。这是张执一同志的人格与精神，也是我们统战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与品德。

张执一同志热爱学习，刻苦钻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写下了大量文章和理论著作。特别是他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著述，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研究价值。文集中既有他经历的统一战线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珍贵回忆，也有他对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和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方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1938年首次出版，是国内第一本对当时中国政党和派别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解放后，他又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所处的政治地位》、《试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著作。这些回忆、研究和论著，是张执一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历史作出的深刻总结和思考，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既给统一战线提供了广阔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统战干部要以老一辈统战工作者为榜样，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勤奋学习，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为开创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执一小传

张纪生 张海生 张楚 张末生

张执一，原名谨唐，曾用名张忍，1911年5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麦山集镇屠家湾村。

张执一的父亲是长江上的轮船工人，聪明好学，喜交游，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领导过船坞工人的罢工。母亲是农村妇女，生性爽朗，为人豁达、勤劳。由于家境贫苦，父母都没有文化，因此，期盼儿子能够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将来能在乡村里当个教书先生，受人尊敬。

张执一7岁那年，父母送他进了私塾。他自幼颇有天赋，但性格倔强。塾师教授的古文，他很快就能背诵，因此，几乎没有受过惩罚。但是，他不喜欢旧式教育的内容和塾师的教学方法，曾三次更换私塾，从师于四位塾师。其中第三位塾师是吴品山，时年20来岁，在武汉读过中学，思想比较进步，经常有旅省返乡的中学生与他来往，少年张执一通过他们的交谈，也接触到新思想，知道了什么是“列强”、“军阀”，知道了孙中山、国民党、“过激派”（共产党）以及“五卅”运动等等，初步产生了爱国主义和“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武汉，赶跑了统治武汉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革命思想带到了江汉大地。在进步知识青年的带动下，张执一参加到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队伍中，跑遍方圆几十

里的集镇和村庄,夜以继日地进行革命串联。1927年四五月间,他刚满16周岁,便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党龄自此时起算),从此走上了视死如归的革命道路。他后来说:“能有幸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说,是革命的大浪潮冲击起来的。”北伐战争“这一革命大风暴、大浪潮冲击下的大部分中国,广大人民都受到了洗礼,接受了一次伟大的思想教育,为下一次革命行动打下了基础。我们这一类土里土气的知识青年被北伐这一大浪潮席卷进去,因而才有机会在革命过程中进一步成长,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张执一始终牢记他入团、入党时的誓言:“信仰主义、阶级斗争、服从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综观他的一生,确实从未违背过这一誓言。

就在张执一参加革命组织前后,时局突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无数先烈倒在了屠刀下和血泊中,中共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遵照党的指示,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1928年二三月间,武汉党的秘密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大部分人被逮捕、被迫转移。其间,张执一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多方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3月,他终于在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找到了党组织,并被通知直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在党的领导下,他联系各学校进步学生和教员,发起成立“武汉青年反帝大同盟”和“武汉反帝大同盟”,并担任主要领导人。同时,他还身兼中共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长,往返于城乡之间。

时值中共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时期。遵从上级指示,张执一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农村暴动和城市飞行集会,在白色恐怖下,执著地继续点燃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后来回忆说,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武昌南长街省立民众实验馆集会,此地北邻国民党的宪兵营,南邻国民党的警察局。那次集会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当时改名张忍,召集了200多学生、工人到场,配合演讲者撒传单、喊口号。很快,大批警察、宪兵包围了会场,他当时也随人群往场外跑,迎面遇到宪

兵,他机智地大喊:“打架,打架,打死人了!”把宪兵的注意力引开。等到宪兵追查喊口号、撒传单的人时,他早已经不见踪影。

1931年初,党组织派张执一到湖北襄樊县,开辟鄂北白区党的工作。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在武汉的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负责人都撤离了武汉,至使张执一再度与组织失去联系。然而,张执一没有消沉,他毅然离开小学教员的职位,返回武汉,联络了30多人,自行组成“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并在内部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创办半秘密刊物“江天”,起草“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宣言,并四处散发、邮寄。他希望在继续宣传革命的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党组织。

1932年初夏,张执一终于接到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通知,命他到上海去接组织关系。在张执一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三进”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一次是“一进”。此前,他曾于1930年12月随湖北乡村师范高中毕业班,到江浙参观教育工作。当时,他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顺路到上海向中共中央递交一份秘密文件,并汇报工作。

此次赴沪,张执一肩负着重新建立武汉党组织的使命,因此,格外小心。抵达后,他听说规定的两个联系地点情况复杂,是托派活动频繁的地方,所以没有贸然接头。他转而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由后者设法转信给党中央,自己先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并根据省委安排,参加上海沪中区委的宣传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工厂的工人通讯员,与印刷厂和铁工厂的党员接洽。9月初,他接到党中央通知,经短期培训后,被任命为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兼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返回武汉,主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学生运动。

返回武汉后,张执一迅速在湖北发展起一批党员,其中包括陈荒煤(生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吕驥(生前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等。与此同时,在武汉建立起多个中共支部,并领导武汉的教员、师范学生开展“罢课索薪”游行。正当工作方兴未艾,并向农村延伸之际,情势突变:中共武汉特委书记叛变了。1932年10月底,张执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从看守嘴中,张执一套出了自己被捕的原因。随即,他设法用暗语将消息传递出去,让有关人员及时转移,防止了党组织进一步的损失。在受审讯时,他坚不吐实,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最后被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判刑7年。其后3年,他先后被关押在武汉宪兵队、汉口军人监狱、湖北第一监狱、湖北省反省院。

张执一时年仅21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但他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目睹了大批革命青年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气节,自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监狱中,他与敌人斗智斗勇,利用刑事犯整治叛徒,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编写、抄录诗文,在难友中间秘密传诵。特别是在进入国民党的反省院以后,他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坚决不肯进行所谓的“反省”,以致被“留期”(6个月一期)。为了营救儿子,张执一的父亲被迫卖地得到300块钱,据说被看守骗取,继因“人财两空”,感到生活绝望而自杀身亡。经母亲以及同乡人共同疏通,利用反省院官员内部的矛盾,张执一终于在1935年8月,以“不得离开武汉和行动随时报告”为条件,获准取保释放。出狱时,他已经24岁,全身骨瘦如柴,家中只有母亲孤苦伶仃一人。面对家破人亡的惨状,张执一又增添了些许成熟,其心其志,执一不二。他珍惜这重新获得的“自由”,更名为“执一”,于9月返武昌找朋友筹措经费,月底“二进”上海,寻找党组织。

到上海后,张执一巧遇熟人,很快就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被分配在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所属的工农通讯社担任沪中区通讯员。他独自一人办起了杂志,主编了半月刊《改造》,出版两期;同时还主办了《新东方》杂志,共16期。这两份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革命的理论,颇受进步青年的喜爱。当时,张执一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经常饿着肚皮工作。为了吃上一口饱饭,有时要徒步走好几里路,到熟人家去蹭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张执一活跃在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学生、工人中间,参与了组织上海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游行、上海各界爱国群众支持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游行示威等大规模的救亡活动。同期,以“高宁”为笔名,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撰写

题为《上海八千余学生救亡运动速写》的报道,披露学生请愿活动的经过。他经常联系文化界人士,参与组建“上海文化救国会”,并担任该会干事;参与组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该会干事会的实际召集人;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国协会等民间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沈均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期间,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奔走于社会知名人士之间,多次参与组织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动员张志让、潘震五等社会贤达出面发动“入狱救国”运动。通过以上工作,张执一结识了不少知名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人士,熟知他们的政治态度,与他们建立了特殊的情谊。1936年春,为了重建武汉党的组织,他在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物色优秀分子,并发展为中共党员,给他们举办短期培训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派往武汉。他还参与了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的筹建,曾借助洪帮帮会的名义,参与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动员、派遣知识青年、技术人员以及工人、难民参加该部队。为了取信于洪帮帮会和更好地领导这支队伍,经党组织批准,他们这批干部还拜了洪帮头头向松波为“大哥”,张执一与陈家康两人被封为帮中地位不低的“心腹大哥”。就是在组建这支部队期间,张执一凭着他对党的忠诚,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对他后来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一次争执。

当时,在党内以“真正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此,张执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与上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言语中表露出对王明的不满。由于这场争论,他险些被王明开除党籍。后因董必武的保护,仅以口头警告“犯有自由主义”而渡过险关。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的帽子,张执一却戴了多年。

上海周边地区沦陷,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张执一于1937年10月底绕道返回武汉,走上了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前沿。翌年,张执一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记录下当时各政党和派别对待抗日的政治表现和基本态度,撰写出版了《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一书。这几乎是当年唯一论述各政党状况的专著,至今具有研究价值。

在鄂西北工作期间,张执一团结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爱国将领,与张

自忠、何基沣、陈离等将军结下深厚友谊。在爱国人士李范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长)、杨显东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帮助下,借国民政府机构的名义,张执一在湖北省谷城县茨河镇,成立了训练抗日骨干的“鄂西北手纺织训练所”,针对各县党组织选送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培训,先后为抗日队伍培养了200多名骨干人员。

自1939年10月起,张执一加入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即新四军五师的前身),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初到部队时,张执一主要做联络工作,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各部队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人们的印象里,张执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统战能手。其实,在军事指挥方面,他也同样出色。

张执一不是军人出身,只不过在17岁时,曾冒名顶替到一个军队办的军官学校里当了不足7天的人伍生,学了几天的队列操练;在乡村发动过几次农民暴动,组织了一支有二三十枝枪的抗捐税的“保卫团”;除此之外,他在上海借洪帮名义组建抗日武装时,为了工作方便,曾挂了一个上尉书记官衔;在鄂西北工作期间,爱国将领张自忠为方便他进行抗日活动,给了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的名义头衔。可以说,在加入新四军队伍之前,张执一没有真正打过仗。然而,他善于学习和调查研究,没有多久,就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建立了在部队中的地位。

张执一经常率便衣队深入敌区,侦察、了解敌情,提出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令便衣队员们赞口不绝的一件事是:一次,他率队潜入武汉侦察,归途中遇到敌人的巡逻哨卡。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执一当机立断,跃马扬鞭,带领小分队人马向哨卡奔驰而去,大喝一声:“自己人!”趁敌人还蒙头晕脑时,他们已经冲出险区,扬长而去。

张执一善于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当时,驻扎在汉阳的伪军黄人杰部、袁杰部两个旅,有1700多人,实际控制黄、袁的是知名人士杨经曲。经张执一的说服工作,杨率两部反正,收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驻扎在湖北潜江县的伪军李正乾部800余人,也

被张执一派人策动反正,收编为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独立一旅。

在抗战相持阶段,张执一向新四军五师领导提出开辟襄南根据地的建议。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带习惯上称为襄南。该地区在抗日战争初期为国民党军队的领域,后被日伪军占领。时任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政治部主任的张执一审时度势,主动请缨,决心攻打盘踞在湖北汉阳侏儒山一带,作恶多端的伪定国军汪步青部。在战役展开之前,他亲自带领手枪队多次进入武汉,扰乱日军视线,营造舆论氛围,对敌开展心理攻势;他设计离间日军与伪军的关系,借汉奸之手导演了一出“蒋干盗书”,向日军送去一封伪造的伪定国军有离异之心的书信,增加了日军对伪军的猜疑,削弱了对伪军的增援;他给被抓获的伪军团长的小老婆布了一个迷魂阵,采用“接力”的手法使她以为我军的机枪和火炮在路两旁摆了几里地,然后,故意放她回去,在伪军中散布我军千军万马开到侏儒山前的消息,增添伪军不战而栗的胆怯心理;同时,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通过策反过来的伪军人员,获得敌人的设防、地形图以及近10天的口令。布局完成后,张执一等率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和天汉游击支队的部分部队,于1941年11月17日至次年的2月5日,先后分三次攻打侏儒山,进行了大小14次战斗。这些战役打出了新四军五师的军威,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和兵工厂全套设备,迫使日本华中派遣军对武汉戒严了3天。

这场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已被我军军史列为抗战时期的经典战役之一。

1942年,张执一时任中共襄河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在紧逼武汉重镇的襄南、襄西大片国土上,开辟了多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稳定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力发展边区生产,为山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的财物支援,保证了军分区队伍的经济自给。此外,张执一派出部队攻打洞庭湖、桃花山一带,建立了湘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我军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洞庭湖以南和鄂西南国民党后方。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和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湖北襄西、襄南共歼敌伪军3000余人;收编反正的伪军和游杂部队2000余人;拔除了熊口等地敌

伪据点数十个；建立了荆潜、江陵、监（利）沔（阳）、天（门）潜沔、汉（川）沔、荆（门）当（阳）远（安）、江枝（江）宜（都）等中共县（工）委和抗日民主政权，为新四军五师完成对武汉的合围，牵制日军对浙赣线和湘北、鄂西的进攻，置敌寇于无后方依托的困难局面的整体战略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年的新四军五师干部中间，人们甚至犹新地记得，在制订“开辟洪湖”的战斗方案时，曾经有一位红军干部非常不服气师部批准了张执一提出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战役胜利结束后，就是这位可敬的红军干部致电张执一，询问“下一仗该往哪里打”。

这一场场的战役和取得的成果，与张执一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在他生前，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亲自参与编纂的《新四军五师战史》中，他的名字总是被别人的名字取代？他坦然一笑，大度地回答说：“这多一年少一载的事情，对我来讲没什么重要，可是，对在军队的同志，就不同了。再说，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争这些呢？”然而，事实终归是不容随意更改的，他当年的战友们每当提及他对新四军五师在敌后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时，无一不钦佩他“通晓敌情、掌握策略、运筹帷幄、忘我工作”；众口赞扬他“以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精神，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投身于中原敌后抗日的斗争，为创业江汉，巩固和发展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4年，张执一参加了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举办的高级干部整风班。同期，日寇发起了河南战役（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退，河南一带存在有利的发展契机，如果能够借此机会打通与华北的通道，可以改善中共豫鄂边区孤立的局面。为此，党中央也向新四军五师发出向河南挺进的指示。但是，在7月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针对会议上提出的“边区工作方针是应以发展为主还是以巩固为主”的议题，会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张执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疾呼：“在巩固中求发展”、“就是倾巢而出地打通通往八路军的道路，也是划算的”，力主向河南方向发展，占据有利地形。然而，张执一的意见被否决。会后他离开新四军五师，以向上级机关汇

报工作的名义,被派往位于安徽的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接受审查。多年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时,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提到:他很欣赏张执一提出的“倾巢而出”。历史证实,如果当年服从了党中央指示,采纳了张执一的意见,1946年内战爆发之初,我军中原部队就不会是孤军被困,发生那场可歌可泣的“中原突围”。其时,张执一已经调到上海工作,在得知消息后,他立即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自己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地组织人员,分头到武汉、上海以及沿线寻找在突围中落难的战友,收容、资助和护送了上百名团职以上干部回到解放区。当时,在突围落难的官兵中间,流传着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到上海找张政委去。”尽管如此,张执一对此却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没能对部队和战友们尽到全部责任。直到30多年后的1980年,他还惦记着这件事情,亲自起草意见,与当年的战友郑绍文、刘少卿、栗再山、刘子厚、赵辛初、刘放、李人林、顾大椿、黄民伟、鲁明健、杨子谦、蔡斯烈等数人,联名上书党中央,为当年突围时遵照组织指示化装突围、投亲靠友隐蔽、被俘时拒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的上万名失散的新四军五师官兵,争取到养老的生活保障,恢复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党籍、军龄、工龄待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执一被党组织赋予特殊使命,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三进”上海,发动领导上海群众武装起义。不久,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政府派出接收大员抵沪,摘取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避免和蒋介石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党中央和中共华中局指示,停止武装起义,立即将主要精力转为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广泛建立工会等群众团体,开展保护工人生活权利,要求复工救济和清算汉奸等斗争。自此,张执一开始了“神秘”的上海地下党秘密战线工作。

从那时起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张执一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根据时局的发展,他筹办过传递中国共产党声音的报纸、杂志,利用国民党滞留重庆的时机,争夺舆论阵地,传播中共的声音。在国民党聚集80万军队,意图疯狂“剿共”之时,他领导的情报网络,向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提供了假造的“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情报,

巧妙地扰乱了美国政府的战略部署,为我军争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时间。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人员和策反争取过来的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人员以及一些进步人士,获取了蒋军作战计划、要塞地图、设防图、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图等重要的军事情报,有力地支持了我军的行动。

同期,张执一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他广泛联系包括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黄炎培、胡厥文、阎宝航等在内的工商界与文化界人士及其他上层民主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共的支持。根据党的指示,他领导创办了党的秘密企业,为党筹措经费,担负掩护任务。其间,直接经他手创办的企业主要有: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糖业公司、渔业公司、运输公司、大安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大多在广州、台湾、香港设有分公司,以拓展业务为名,担负联络和掩护任务。他组织开辟了几条通往东北、胶东、苏北解放区的水路秘密交通渠道,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区输送干部、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药材、布匹等物资。他领导建立了“中华医药化验所”、慈善会的“难民收容所”、杭州凤林寺内的医院、“联合药房”等多处秘密联络、掩护点。在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我中原解放区进犯时,他就是通过这些秘密网点和交通线,寻找、保护和输送了王树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颜东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等数以百计“中原突围”后途经上海的我军中原部队团以上干部,使他们安全到达我山东和东北解放区。

当时,国民党特务经常利用帮会流氓充当打手,扰乱我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针对这种现象,张执一受命组建并领导中共帮会工作委员会,开展对帮会各个层面的工作,有效瓦解了敌人的阴谋。他还兼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通过浙东临时工委,统一管理浙东地区的地下党和农村武装组织,组织打击当地反动地方政权和乡镇武装,发动以反抽丁、反征粮、反霸、开仓济贫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壮大了革命武装,使浙东游击队从300多人发展到数千人。这支部队后来划归解放军华中军区,成为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他组织“中原突围”的干部谢威(生前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人,成立中共湘鄂

特委,重返鄂东、洪湖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或地下工作。他布置筹建武汉地区秘密交通联络站,开辟多条交通线路,护送重要干部过往和运送紧缺物资。他奉命负责联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先后4次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检查、布置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并选派一批干部赴台开展工作。

张执一兼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策反成绩显著。其中包括: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的574名官兵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起义,策反关键时刻,张执一曾不畏危险,亲自赴约会见该舰枪炮长陈仁珊等人,阐明中共政策,获取了信任;国民党驻浦东的伞兵团三团3000人,在团长刘农峻的率领下起义,由经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后勤总司令兼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派吴淞基地的“中102”登陆艇送抵连云港附近的解放区。此外,还有国民党飞机20余架、小型舰队、江阴要塞官兵、整个民航系统的起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号”舰艇与伞兵团起义时,由于秘密电台无法用规定信号与解放区取得联系,张执一不顾自身暴露的危险,毅然指示以他的真实姓名明电通知解放区予以接应。他还指使经策反的国民党装甲兵第四团团长,故意弄坏装甲车,堵塞浙赣铁路线,拖延国民党军队向台湾转移的时间。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的另一件事,是成功策反蒋经国的嫡系、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第一总队4000多人,在总队长、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的亲自率领下于嘉兴起义。尽管该部队起义后在国民党围追时被打散,但是,此举对国民党内部的信心乃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为迎接上海和全国的解放,张执一受命安排30多名著名的爱国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海解放前夕,他受命领导上海市政接管组的工作,除加强对公用、财政、银行、民政、医药卫生等重要部门中秘密党员的领导,还提前布置在国民党粮食储备会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杨显东,全面调查上海地区的粮食、棉花、棉纱、布匹、汽油、煤炭、木柴等物资库存和进出情况,为平稳接管上海这座重要的经济城市做好准备。